

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

——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

陳豐祥

一、前言

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與行動，主要是由元老、政府（外務省）、軍部、大陸浪人（註一）等各方面的勢力所推動。其中由於彼此觀點不同，或利害不一，因而在政策的發展上難免呈現激進與緩進之分，以及角色的主位副位之別，但是在追求雄飛大陸以期實現其國家主義的動機與目標上，實無二致。

就日本大陸浪人而言，由於本身不具官方身分，與政府機關亦無直接隸屬關係，僅以個人對亞洲大陸的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立場與態度（註二），為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而積極從事實地的探訪調查、情報搜集、煽風點火等活動；因此，其行動方式雖然大多隱微不彰，而其結果則往往攸關日本大陸政策的成敗與亞洲鄰國的安危。故曾經先後與日本「玄洋社」、「黑龍會」等國家主義團體有深厚淵源的「國士」內田良平（註三），即以「東亞先覺志士」稱呼大陸浪人，並推崇此輩大展「東亞經綸」之偉業云：

顧先覺志士挺身從事東亞經綸，實我對外國策之先驅。此輩人士之冒險犯難，破產殞命，自甘爲國家犧牲，以奠定對外發展之根本，制東亞之大勢，常利導輿論，振奮人心，斷然確立國是國策之基礎，以獲致今日之隆運，其功業頗令後人感奮興起（註四）。

因此，大陸浪人的活動，顯然是與代表日本政府的元老、外務省、軍部等所推動的大陸政策內外相應，輔車相依，成爲日本侵略亞洲大陸的一大特色。惟有關於日本官方推動的大陸政策之研究，中外學者已有豐碩的成果（註五），但關於日本大陸浪人的論述，則向來較少整體性、系統性的分析探討，實有待進一步的評述研究。

無可否認的，明治以降日本對外關係發展的特徵之一，就是持續不斷的以帝國主義式的擴張侵略加諸亞洲鄰邦；因此學者常以「亞細亞主義」的概念，批判或解釋日本的對外關係（註六）。所謂「亞細亞主義」，據著名的亞細亞主義學者竹內好所作的定義是：

亞細亞主義具有某種實質的內容，不是客觀上能夠限定的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傾向性。……亞細亞主義與膨脹主義或侵略主義並非完全重疊，而且也未與 nationalism（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主義或國粹主義）完全重疊；當然，也未與左翼 internationalism 重疊。然而，也有與它們重疊的部分，尤其是膨脹（擴張）主義就是最大的重疊（註七）。

上述的所謂「傾向性」，是指亞細亞主義的本質，「與衆所公認的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等思想不同，並非將價值在自我身上內化，因此不能完全自足自立，而必須依據其他的思想來表現（註八）」，換言之，在許多不同性質的思想中，均有可能帶有亞細亞主義的傾向性，可知亞細亞主義並非獨立存在的東西。不過正如竹內所強調，此種傾向的共同特徵是「亞洲各國連帶（不論是否以侵略爲手段）的指向」（註九），亦即爲求抵抗歐美列強對亞洲的侵略，凡主張以日本爲盟主而團結亞洲各民族的思想與行動，不論其是否以侵略爲手段，均屬於亞細亞主義。

針對竹內所謂不論是否以侵略爲手段，凡有「亞洲各國連帶的指向」即爲亞細亞主義的觀點，初瀨龍平在所著《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一書中，進一步將之區分爲兩種類型，即純粹的「亞細亞連帶主義」與具有侵略意

識的「大亞細亞主義」。亞細亞連帶主義是基於日本對外的危機感與使命感，期待朝鮮、中國也能形成民族國家，代表人物是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民權派系統；大亞細亞主義則擬建立以日本為中心，並能以華夷秩序類推的國際階層體系，而侵略朝鮮、中國則為其手段，代表人物是內田良平、頭山滿等玄洋社及黑龍會系統（註一〇）。此種分類方法，確有相當的史實根據。

事實上，無論是日本官方的大陸政策，或是代表民間的大陸浪人，他們所表現的思想與行動，均帶有明顯的亞細亞主義傾向。不過，此種傾向究竟是亞細亞連帶主義？抑是大亞細亞主義？兩者之間有無交替轉換的演變？這些都是值得研究也極高趣味的問題。本文是作者有關近代日本大陸浪人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以浪人荒尾精的思想與行動為中心，探討甲午戰前日本亞細亞主義的傾向及其影響，藉以澄清中日關係史中隱晦不明的盲點，進而對日本大陸政策的侵略本質提供更有力的註腳。

二、荒尾精亞細亞主義思想的萌芽

荒尾精（一八五八——一八九六），父荒尾義濟，原為名古屋藩食祿百石的藩士，維新變革之際，家道中落，迫於生計，乃以經營雜貨店糊口，生活困苦潦倒。荒尾精以家貧緣故，無力向學；其後幸得東京麹町警察署警員菅井誠美相助，得以寄食菅井家，並繼續學業。

一八七二年，荒尾年十五歲，就讀東京外語學校，專修法文。是年征韓論起，西鄉隆盛及江藤新平等均因之辭職下野。菅井家本為鹿兒島人，故家中座上客常見鹿兒島出身的陸海軍將校，他們除同情故鄉豪傑西鄉隆盛的遭遇外，更憤韓國的暴慢無禮與中國視韓國如屬邦，因而慷慨陳詞，語多激切。荒尾耳聞目睹，深受沾染感化，自是有西渡中國，盡瘁東亞各民族，以立日本為東洋盟主之志（註一一）。

由此可知，荒尾的大陸雄飛思想，是萌芽於青年時期征韓論的刺激。而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征韓論的歷史意義，不單純是日本為其國家的「體面」問題而欲興兵「膺懲」韓國，事實上也具有促進其「國家發展、民族雄飛」，

以展現所謂東亞經綸的意圖（註二二）。因此，頭山滿在江藤新平的傳記序文中特別強調征韓論的意義，認為：

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之征韓論，乃維新中興之精神，國民對外思想之發揚也。惟因征韓論分裂，將其朝向大陸發展之民族進取精神壅塞鬱積於內，以至成為佐賀之亂，成為荻之亂，成為十年（一八七七）西南之亂，而對外派撲滅殆盡。然而，國民磅礴之元氣，一發而為征清（甲午）之役，再發而為討俄之役，使我帝國宣揚國光於宇內，以至稱霸於東亞大陸者，其根源未嘗非出自征韓論也（註二三）。

頭山對征韓論的意義詮釋，與另一位黑龍會頭子內田良平的觀點極為近似。內田在黑龍會所編纂的《西南記傳》序文中，也明白指出征韓論在明治史上的特殊意義，就是展現日本的「國民精神、國民元氣」。內田說：

征韓論的主張與特質，乃國民之精神，國民之元氣也。（明治）二十七年、八年之膺懲清國，保護朝鮮者是征韓論之精神，割取台灣及澎湖列島，使聖明之皇化廣被者亦征韓論之精神也。三十七、八年膺懲俄國，保全滿州者是征韓論之精神；而割取樺太（庫頁島）之一半，使祖宗之版圖收復者亦征韓論之精神也。又於四十年合併朝鮮，解決四十年來之宿題，樹立東邦和平之基礎者，亦征韓論之精神也。吾人故曰：征韓論乃國民之精神，國民之元氣也。（註二四）

由頭山及內田二人對征韓論的看法，可以充分印證征韓論本身確實具有竹內好所謂的「亞細亞主義」的特徵，亦即內容具有侵略主義或擴張主義的傾向。無怪乎近年來在日本復活的軍國主義史觀，均以日本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於發揚對外侵略思想的征韓論、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理論給予肯定的再評價，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即是典型的例子，林房雄強調：

西鄉（主張的征韓論）考慮了日本的進路與東洋的解放，並非希望滿足「失業武士團體野心」的封建制度得以復活。西鄉的「思想」，當然是與「大東亞戰爭」相連的。（註二五）

林所謂「日本的進路與東洋的解放」，是將征韓論與大東亞戰爭連成一線，則征韓論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推動亞細亞主義的權輿。荒尾青年時期耳聞目睹征韓論爭餘波盪漾，因而有「西渡中國，盡瘁東亞各民族，以立日本爲東洋盟主之志」，也是此種亞細亞主義思想的萌芽，而且具有濃厚的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傾向。

由於征韓論的影響，荒尾已沾染明治時代的「國民精神與國民元氣」，積極有「興亞主義」之志，乃決意棄文從武，並自白心跡說：

就讀外國語學校，難獲所欲，不如退學從軍，學練兵術，兼習清國事宜，以備他日之需（註一六）。

當時日本的軍人養成辦法，規定入伍生必須先入教導團接受基礎訓練，再從教導團結業的下士中選拔優秀者進入士官學校就學。因此，荒尾離開外國語學校後，旋即於一八七八年轉入陸軍教導團，一八八〇年更獲遴選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接受正規的軍事教育。

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壬午事變，日本朝野震驚，唯恐中國合併朝鮮，將使日本國防顯露破綻，而且阻塞日本大陸發展之路；尤其西力東漸之勢與年俱增，中國以老大衰敝之國必難與之抗衡，其勢將使中國與朝鮮皆淪爲歐美列強祭品（註一七）。當時新興的國家主義團體玄洋社，有感於時局危殆，乃欲糾集同志組織義勇兵，做爲征韓之急先鋒，後因日韓濟物浦條約成立，征韓之事卒成泡影（註一八）。然而，壬午事變除了促成明治政府決定擴軍政策外（註一九），更促使在野民權派如熊本的宗像政；鹿兒島的長谷場純孝、和泉邦彥；土佐的中江篤介（兆民）；愛媛的末廣重恭；三重的栗原亮一；奈良的樽井藤吉等，共謀確立對華行動方針，其後更將此大陸經營的方針與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及頭山滿等諮商。平岡及頭山均甚表贊同，頭山甚至呼籲：「若能取大，則小者將不勞而獲，若取支那，朝鮮將不招而來，故與其向小朝鮮不如處理大支那爲佳」。於是日本所謂的「民間志士」，乃相率渡海，狼奔豕突以經營大陸；玄洋社社員九十餘人即應召響應大陸冒險，開啓大陸浪人活動的高潮。此時荒尾雖仍肄業於士官學校，但讚嘆頭山的大陸經營理念，兩人自是相識，此後更結刎頸之交（註二〇），益增荒尾渡海經營大陸之願望。

荒尾當征韓論爭大起時已有興亞之志，此時即將畢業之際又逢壬午事變發生，深受玄洋社等「民間志士」相率浪居大陸之刺激，乃決心於修畢軍事課程後立即西渡中國以償宿志。惟因荒尾在校成績優異，志氣恢宏，師長、同儕均以未來將軍期許；對於荒尾擬定辭退軍職並西渡大陸之計畫，咸表驚訝與不解而再三勸阻，陸軍當局亦不允許新科士官辭職他就，荒尾不得已暫時打消西渡中國之計。當荒尾奔走辭退軍職以便西渡之際，曾往陸軍省拜見陸軍卿大山巖，兩人有段露骨的對話，可以看出荒尾西渡的目的所在。大山首先質問道：

當今才俊之士無不期盼留學歐美，唯獨足下何以願往固陋至極的中國？

荒尾答稱：

世人都醉心歐美而不屑一顧中國，因此才想去中國。

大山再問：

到中國去將做什麼？

荒尾回答：

先到中國，再取中國，然後善加統治，藉以復興亞細亞。（註二一）

雖然，此時的荒尾已有改造中國是復興亞洲的先決條件之想。不過，荒尾的中國之行既告中止，一八八三年自士官學校畢業後，隨即奉命服役於熊本第十三聯隊，然而西渡的願望未嘗稍減。當時熊本師團有留華學中文歸國任職的隊職官御幡雅文，荒尾特請求搬入同一宿舍，俾便業餘之暇就近從御幡學中文，故進步頗為迅速。此外，荒尾公餘亦頗愛讀王陽明的傳習錄，對於知行合一哲學的精神深有體悟；並經常以柔道、居合術鍛鍊身體，未嘗一日鬆懈，以備他日雄飛大陸之用（註二二）。

荒尾在熊本聯隊前後二年，其間日本「民間志士」在華的活動日益積極，對於荒尾的思想與行動均有相當影響，其中「福州組的舉兵計畫」與「東洋學館的建立」兩件事影響最大。所謂「福州組」，是指日本明治初年激進的大陸派人士，基於亞細亞連帶主義的體認，認為歐洲列強的侵略遲早將吞併中國，所以日本必須先下手在中國培植勢力，藉以擴大國防前線，俾能抗拒列強，保全東亞。而為達成此目的，軍人出身的小澤豁郎、曾根俊虎，以及

佐賀出身的民間人士山口五郎等先後來華，成為大陸浪人的先驅。其中山口是一八七四年日軍侵台事件之後由台灣渡海抵達福建，隨即以蘇亮明之名與哥老會一系接觸往來，山口、小澤等的活動，時人即以福州組稱之。當中法因越南問題時起衝突之際，另有會津出身的白井新太郎等人於山東芝罘成立「芝罘組」，與福州組南北呼應。及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福州組即擬聯合芝罘組同時舉事，冀圖帶動中國四百餘州的響應，以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其後由於日本政府的出面干預，福州組的舉兵計畫卒未成功，但此種大陸經營的思想與行動，對於急欲雄飛大陸的荒尾等「民間志士」，自有相當的啓示作用（註二三）。

其次，當福州組擬議舉事之際，部分日本在野政客為期對華政策的早日實現，乃由末廣重恭、佐佐友房、長谷場純孝、中江篤介、栗原亮一等倡議在中國上海設立「東洋學館」，以培養經營大陸的人才。時熊本入日下部正一力讚其議，特遊說甫卸任玄洋社社長職務而專心經營礦業的財主平岡浩太郎，強調設立東洋學館的目的是：

上海為東洋第一要港，在此設立學校大量培養青年子弟，使之通曉中國國語國情，乃他日經營大陸所不可或缺。吾友山口五郎遊歷中國已久，通曉當地語言風習，且與革命黨（會黨——筆者）志士時相往來，如能使山口任其事，以備他日有事之用，則吾人昔日宿志可以實現（註二四）。

平岡嘉許其志，力勸玄洋社社員支持，並願協助籌措經費，東洋學館始得順利開館。平岡並與末廣重恭、宗像政、樽井藤吉、中江篤介、杉田定一、日下部正一等七人連袂航渡上海，積極主持開館事宜。此時平岡躊躇滿志，揚言：「清國政府腐敗已極，欲顛覆之，我同志七人足矣！」中江兆民也附和說：「英雄豪傑一起，天下如響斯應，此中國人之本色，清國真乃英雄成事之地也！」由此可知，東洋學館的設立，不僅具有日本亞細亞連帶主義的象徵，而且也是推動大陸經營的模式之一；其特徵是以學校教育為名而大陸經營為實。故東洋學館雖然規模甚小，學科也以語言教學為主，學生僅十數名而已，但入學的學生均有氣吞中國四百餘州的豪情壯志；其龍吟虎嘯，意在喚起大陸風雲的飛揚氣焰，使該館宛如賊窟山寨。其後雖因經費困難，開館後僅一年餘即告關閉，但此種大陸經營的新模式，卻成為後來「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之先驅」（註二五），足見其影響之大。

一八八五年，荒尾奉調參謀本部「亞細亞的支那科」服勤，對於西渡中國的計畫愈趨積極，除了利用參謀本部所藏有關中國之書籍、地圖，詳加研究理解外；更廣結有志經略東亞之同好，其中對荒尾影響最大者是今野嚴太與根津一。

據《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所載，今野嚴太為會津人，幼年喪父，由其母獨力撫孤；其母雖一介女流，然極富愛國心。今野七、八歲之際，俄國領有樺太（庫頁島），其母慷慨悲憤，視為國恥，因此勉勵今野：「只有能收復樺太的人才真正的日本男人，你長大後不能忘此國恥，必須收回失地。」今野深受感動，矢志收復樺太。及長，今野計畫從事海外遊歷，足跡所至，遍及北海道、樺太、西伯利亞、蒙古、印度、波斯、中南半島，中國雲貴地區，並曾投身到劉永福的黑旗軍。今野餐風露宿、忍飢耐苦的長途跋涉，以及不辭艱危、不屈不撓的調查事業，對於荒尾往後的大陸經營工作，具有相當的示範作用（註二六）。

根津一為荒尾前後期同學，雖早荒尾一年入學士官學校，但在學中因屢次轉換主修課程，初由特科生轉騎兵科，再轉工兵科，又轉砲兵科，故畢業時較荒尾猶晚一年。根津與荒尾均極重視精神修養，兩人曾召集校中志同道合者共組「谷中會」，每到週日即相聚於士官學校附近的山谷中，炊飯共食，研讀有關節義書籍，談笑之間相互砥礪氣節，在學生中屬於剛正廉直的一派。

當荒尾任職參謀本部期間，根津已進入陸軍大學就讀，兩人仍時相往來，縱論東亞形勢。深感西力東漸太甚，其中尤以俄國對東亞的壓迫最急迫，因此兩人均痛感必須及早講求抵禦的方法；同時，為期東亞大局之安定，兩人也一致同意必須促使中國覺悟，並結合中日兩國之力以抗拒西力東漸之勢，所謂亞細亞連帶主義幾已是兩人的共識。故荒尾於一八八六年出發前往中國之際，特向根津叮嚀：「我先去中國，你在陸軍大學學習高等戰術，大學畢業後即來中國，共同為東亞效力。」（註二七）此種大陸經營的志業，代表了日本幕末時期的經世思想與海外雄飛論的具體行動（註二八）。

由上所述，可知荒尾精的亞細亞主義思想是肇端於征韓論之啓示，因而棄文從武，接受日本軍人的養成教育，以備他日西渡中國從事大陸經營之需。經壬午事變後，荒尾益感東亞情勢之險惡，亞細亞主義急待付諸行動，乃斷

然決定士官學校畢業後立即辭退軍職航渡大陸，以實現「取中國並善加統治，藉以復興亞洲」的志業；其後雖因軍方反對而未果，但荒尾對於「大陸經營論」的執著未嘗稍變，所以當時由民間人士所推動的「福州組舉事計畫」與「東洋學館的設立」，對於荒尾亞細亞主義思想的形成具有相當的啓示作用，並且影響後來在華的行動。此後荒尾積極研究有關中國的書籍及地圖，廣結志同道合的友人，充分顯示其發展亞洲經綸的豪情。惟其終極的理想是在重振東亞，似乎仍屬富於浪漫色彩的亞細亞連帶主義。

三、荒尾精與漢口樂善堂

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思想，誠如林房雄所言，是建立在「日本的進路與東洋的解放」基礎上，此種共同體理論的亞細亞主義，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理論支柱。如進一步分析此種理論的根源，則由於西力東漸所體認的危機感，以及基於此種危機感而要求解放亞洲民族的使命感，應該是兩個相輔相成的要素（註二九）。然而，要排除日本進路的障礙以化解危機感，進而解放東洋以成就使命感，必須先行知己知彼，始能百戰不殆。因此，在亞細亞連帶主義中向被視為日本進路障礙與解放對象的中國，就成為日本大陸浪人活動的主要目標。

日本大陸浪人的在華活動，並非始自荒尾。早在荒尾來華之前，擔任明治新政府中弁兼制度分局御用掛的江藤新平，已於一八七一年三月致函當時的大納言岩倉具視，陳述其對外政策意見書，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江藤特別指出：「支那之勢也，人民愚而技藝拙，國政不振，盜賊頻起，衰頹極矣！若魯（俄國）一旦與美、亨（德國）聯結攻擊，得之必矣，若至於此，則皇國將危如累卵」，江藤進而指出中國的形勢地位：「支那者，亞細亞必爭之地也，不得之者危，苟得之則將占有亞細亞之形勢也！」因而提出了日本應對的策略，強調必須派遣僧俗間諜從事各種偵察行動，以做為攫取中國的準備（註三〇）。

江藤的建議對於此後日本的大陸經營政策影響頗大，譬如同年十一月因琉球人在台灣南部遭生番殺害，日本即藉此派遣成富清風、福島九成、黑岡季備、兒玉利國、吉田清貫、田中綱常、水野遵等，或抵台灣，或赴福建，進

行各種地理、軍備情況之調查研究。又如一八七二年五月，時任參議的西鄉隆盛亦派遣陸軍少佐池上田郎、大尉武市正幹、外務權中錄彭城中平等，前往滿洲偵察軍事（註三一）。其後日本對中國國民的動向、地理、風土、軍備的情況，均持續不斷的進行偵察研究。影響所及，日本民間人士亦相率渡海來華，前述的福州組及東洋學館的建立即為顯例。

荒尾的來華，除了本身亞細亞主義的自覺外，日本幕末以來經世思想及海外雄飛論的思潮，以及明治初年以降對大陸持續不斷的偵察活動，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一八八六年荒尾第一次來華，即是奉參謀本部之命，而且事先已除去軍服，佯裝一般旅客，首站抵達上海，隨即往訪販售藥品、書籍、雜貨等商品的樂善堂主人岸田吟香。

岸田出身日本岡山縣，為幕末憂國憂時之士。曾於一八六四年創辦「新聞紙」，為日本最早發行的報紙。一八六一年時曾因《和英辭林集成》的出版印刷來滬二年，完成日本第一部日英辭典。滬滬期間，岸田頗留心觀察中國情勢，歸國後即於一八七二年創刊「東京日日新聞」，自任主筆，以其如椽巨筆縱橫評論時事，成為當時日本四大名記者之一。一八七四年日軍征台之役時，岸田以從軍記者身分報導戰地通訊，深受讀者歡迎。一八七七年，岸田辭新聞社工作，另於東京銀座經營樂善堂藥鋪，以販售精錡水眼藥獲利甚豐。翌年，岸田又於上海英租界開設樂善堂分店，仍以販售眼藥水為主，其後兼及銅版印刷事業，翻印諸子百家著作及科舉應試用書，深受各方歡迎。惟岸田雖然事業有成，然而目睹歐美列強對華的貪暴，亦深以東亞前途為憂，認為日本必須培養有志對華工作的人才；因此，凡有志於對華工作的青年後進抵滬，岸田均以食客厚待之，樂善堂寄寓之食客由是不斷。（註三二）

荒尾與岸田一見如故，乃陳述自己計畫，擬於漢口別設樂善堂支店，以商人身分從事調查工作。岸田不僅立即表示同意，而且願意供應所有商品，並力促荒尾儘速成行。

在獲得岸田允諾充分援助下，荒尾的漢口樂善堂支店不久即掛牌營業，商品包括書籍、藥品、雜貨等，均由上海的岸田供應，初期經商情形頗能穩定發展。但荒尾職責所在並非營事末利，而是必須將各地調查情形報告本國；因此，為了順利達成使命，荒尾特別招募上海、天津等地日籍人士前來漢口協助。結果先後應募來漢口者有井深彥三郎、高橋謙、宗方小太郎、山內崑、浦敬一、山崎羔三郎、藤島武彥、中野二郎、中西正樹、白井新太郎、石川

伍一、片山敏彥、維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錫安之助、北御門松三郎、廣岡安太等，年齡均在二十至三十歲間，都是意氣風發的青年後生，荒尾特爲之訂定各種規則如下：

一般規則

第一條：本堂之目標極爲遠大，故任最重而道最遠，豈輕進散漫所能倖致。其興廢之關係處實不少，宜深遠慮，慎其蹤跡，重其舉動，務期萬無一失，並能俟機以疾雷激電，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目的。故首重自省，平常與人接觸應以溫和有禮爲要，不僅決不可有類似青年書生之舉動，特別是與支那人相遇時，儘可能輕其舉動，並轉移商業話題，佯裝商人。

第二條：各盡本分屬當然，縱有餘暇亦應謹言慎行，培養實力爲要。

第三條：堂員同志區分爲二，一爲外員，一爲內員，以堂長總轄之。

第四條：堂長應經常督促外員，注意其事業之進退，並留心一般大勢，專心計畫其發展事宜。

第五條：外員直接獨當一面之重任，故應巧妙避免活動之嫌疑以完成各項任務目的，並自行注意當地大勢，務使他日便利之各種事情，均能講究而無遺漏。

第六條：內員應致力於分內事務，專心謀求事業發展，同時提供諸外員之便利。

第七條：每年春季召集各外員召開總會，惟依本堂或外員之安排，堂長或內員巡回各地時得停止之。

內員規則

第一條：內員分爲理事、外員課及編纂課三種，各相關人員得視事務之繁簡與堂員之多少增減之。

第二條：（略）

第三條：外員課常與外員聯絡，瞭解在外幹部情況，同時將國內外大勢、本堂活動情形、外員方便參考的各種事物摘要彙報；各外員活動的補助計畫，以及本堂每日事業大小的摘要均做成簡單目錄。

第四條：編纂課應將各地的報告及東西方各種報紙新聞可供他日參考者加以摘要編纂。（註三三）

第五條至第八條：（略）

荒尾爲期調查工作能順利擴及全中國，因此以樂善堂爲中心，另在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設工作站，每站設主持一人，負責指揮該站的調查工作，其活動情形如下：

(一)湖南支部：初由高橋謙主持，後因高橋轉任四川支部，改由山內崑接任。調查的動機是因湖南人才輩出，尤其是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等皆湖南人，故深感湖南人傑地靈迥異他省，將來對中國前途必有重大影響。何況當時湖南僻處內陸，連外國傳教師之足跡亦所未至，更認爲有進行調查的必要。

(二)四川支部：由高橋謙主持，另有石川伍一、松田滿雄、廣岡安太等人參與。荒尾因鑑於巴蜀僻處中國西南，形勢自然天成，爲有志於中國經營者所不可忽略的樞要地區，故特選定爲根據地以備將來之需。其調查範圍除四川外，更深入西藏及雲貴苗蠻地區。

(三)北京支部：由宗方小太郎主持，另有北御門松二郎、河原角次郎等參與，主要是在探查中國官員的行動，中央政治的情況以及滿洲的情勢。

此外，由樂善堂直接派赴各地進行調查者，尙有山崎羔三郎、藤島武彥、浦敬一等人。山崎奉命往雲南、貴州、廣西等地調查；藤島則進向甘肅、河南、江西等地；浦因俄國擬建築西伯利亞鐵路，且將延長中亞鐵路至伊犁，故奉命前往新疆遊說伊犁將軍劉錦棠，擬請設法阻俄勢南下（註三四）。由此可知，樂善堂人員的調查範圍幾乎遍及中國大江南北，尤以西北及西南邊區爲調查重點，顯示樂善堂的調查工作具有特殊的意義。

至於外員調查的對象，荒尾除規定土地、被服、陣營、運輸、糧食薪炭、兵制、各種製造廠、山川形狀、人口疏密、風俗善惡、社會貧富等軍事、經濟、社會項目外，尤側重人物方面的調查，頗能顯示荒尾大陸經營理念的特色。荒尾將人物探查的對象分爲六大類，即：君子、豪傑、豪族、長者、俠客、富人；要求樂善堂的外員必須充分盡心的將上述六種人的住所、姓名、年齡、行跡等詳細調查記錄。荒尾甚至將各種人物的異同詳加分類說明做爲外員探查記錄的參考。譬如：

一、東洋君子之志如左：

修道以救贖世界 第一等

修道以復興東洋 第二等

變法改革以拯救其國家 第三等

鼓舞子弟以道覺悟後世 第四等

立於朝而治國 第五等

獨善其身以待良機 第六等

一、東洋豪傑之志如左：

顛覆政府實施新政

起兵割據一方

懲西洋人之跋扈並逐出國外

欲攫取西洋利器者

以工業爲目的者

以軍備爲目的者

以商業爲目的者

以農業爲目的者

二、豪族：

豪族爲古來名家之後或古來之豪富。故有豪族之名者未必賢，且未必俊，凡愚皆有，然而多有人望，鮮有忌之者，故得一人可得一鄉之人也。

一、長者：

家富而好施貧者

愛鄉人而善導之

或有才學或雖無而質佳也

雖有濟世之志而不大

似無君子之學識者

此長者亦一鄉所仰望也，故得一人可得一鄉之人也（註三五）。

綜觀荒尾主持樂善堂的調查工作，無論其調查的範圍、對象、方法，都足以代表日本大陸經營理念的一種典型（註三六）。正如荒尾所強調的：

吾輩同志之目的，乃在爲全世界之人類，其根本方針就是改造支那（註三七）。

荒尾當征韓論起之際已有興亞之志，在士官學校臨畢業時也有「先到支那，再取支那，然後善加統治，藉以復興亞細亞」的豪語（註三八），及至主持樂善堂後，始有機會進行「改造」中國的計畫，前述樂善堂外員的調查範圍、對象、方法等，都是荒尾改造計畫的一部分，而其理論的依據則是「興亞策與宇內一統論」。

荒尾的「興亞策」，是一種植根於日本危機感與使命感的亞細亞連帶主義思想。由於一八八〇年代後期中國國勢愈衰，而俄國正積極修築其西伯利亞鐵路，對滿洲及朝鮮造成直接衝擊；加上中亞細亞鐵路亦將延長至新疆伊犁，英法兩國又眈眈虎視於兩廣、雲貴甚至西藏，面對此種危局，使日本朝野識者均深以中國及朝鮮的前途爲憂以及唇亡齒寒之感。荒尾當時既爲軍方派赴中國從事偵察工作的諜報人員，其在華活動的主要目的，當然是提供知己知彼的情報，同時亦有設法將日本的國防前線擴展到中國西南及西北邊境之深意。故荒尾先後派遣樂善堂外員遠赴雲貴、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進行調查活動，事實上即是代表亞細亞連帶主義共同對歐洲列強警戒的作用（註三九）。然而，荒尾似乎在上述軍事意義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之外，更寓有「改造」中國的思想與方法。荒尾在敘述其興亞政策時首先分析東亞的情勢說：

歐亞兩陸東西文化迥異，黃白二色本非同種，所謂西力東漸者正意味此二者之競爭。因此朝鮮之貧弱，縱令

不爲朝鮮憂，亦當深爲我國憂；清國之老朽，縱使不爲清國悲，亦當痛爲我國悲。我國苟欲內張綱紀外加威信，使宇內萬邦永永瞻仰皇祖皇宗懿德，則必須先救此貧弱，再扶此老朽，使三國鼎峙，輔車相依，進而挽回東亞衰運，恢宏其聲勢，膺德西歐之豺狼，以杜絕其覬覦之心，此誠國家百年之長計，亦爲當前刻不容緩之急務。……東方的故國舊邦漸次淪爲豺狼食餌，至於今除我帝國之外，僅剩支那朝鮮二國而已。其所以貧弱至極而未滅，老朽已極而未亡，一息尚存而得以勉強維持其宗廟社稷於艱危困艱之境者，蓋天意猶未厭棄東亞……。（註四〇）

荒尾進而強調東亞的變局是不可抗拒的天意，鑑於順天則存，逆天則亡；從天則成，背天則敗的古訓，所以既然熱愛祖國，則必須誘導扶持中國朝鮮以屏障東洋。荒尾指出：

何謂天意？曰無他，救其貧弱，使其富強而已，去其老朽使之剛壯而已，此事實我帝國之天職也，順天之責任也。（註四一）

顯然，當時的荒尾是基於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共同體觀念，企圖促使中國革新改造，然後利用中國的財力，陸上訓練百二十萬以上的雄兵，海上整備百艘以上的戰艦，「以日本尙武之氣調和支那尙文之風，文武並行而不悖，進而相輔相成，將可使東洋文明照耀於宇內，亞細亞的威風昂揚於四海。若是則抗禦西力東漸之勢，相信並非不能」（註四二）。

荒尾爲了達成改造中國的目的，除了特別要樂善堂求的外員積極進行一般軍事性、經濟性目的的調查外，對於重要人物的探訪，更列爲調查工作的重點；此種安排，也正代表荒尾獨特的大陸經營理念。荒尾深知改造中國並非少數浪人的活動所能奏功，而且鑑於前述山口五郎、小澤裕郎等與哥老會往來並成立「福州組」的經驗，所以特別規定人物探訪的對象，除哥老會、九龍會、白蓮會以及烏賊等匪類外，尤注重君子、豪傑、豪族、長者、俠客等人物的調查。其中「君子」因志向大小而分爲六等，志向愈大者，愈是日本所應爭取借重的目標；如「修道以拯救世界、復興東亞」分居第一、二等，其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也最明顯，對於深具亞細亞主義思想且積極推展東亞

經綸的荒尾而言，自然是最佳的合作人選。證諸民國以後主張中日親善提攜的政壇人士，大都屬於此輩有「志」之士，荒尾似早已有先見之明。此外，「志」在「變法改革以救國」的改革派人士則屬於第三等，荒尾似已預見中國將有改革者應時而起，因而主張先行探查瞭解以備他日之需。事實上，無論「君子」的等第如何，其身分應該都屬於官僚集團；荒尾為求順利改造中國以復興亞細亞，因而擬利用官僚集團中的有「志」之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確實是日本大陸經營的典型。

荒尾也極重視「豪傑」之士的調查，其心目中的豪傑包括「顛覆政府實施新政」的革命派人士、「起兵割據一方」的軍閥梟雄、「懲西洋人之跋扈並逐出國外」的守舊排外者，以及能促進各種產業發展的實業家等，他們都是各行各業獨領風騷的頂尖人物，對社會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當然也是「改造」中國所不可或缺的好幫手。其他如豪族、長者、俠客等，由於在地方上均有一呼百應的號召力，得其一人即可得一族、一鄉、一派之人，荒尾當然刻意加以經營，以利「改造」大業的進行。

然而，荒尾以樂善堂為中心所推動的中國改造計畫，果真是建立在單純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上？事實不然，荒尾深恐中國一旦強大將不利於日本，因此在「改造」中國的同時，已心懷戒慎恐懼，認為「相扶相持以挽回東亞大勢並排拒西歐之侵略，乃我國以天職提攜清國富強之本旨。然而清國若已趨富強，又起而試圖反噬，則我國不啻是唇齒鼎足之勢，反而在一水之隔的對岸製造數倍於英俄的強敵。謀求東洋之興隆與和平，反招致騷亂與危亡。」（註四三）荒尾於是提出「宇內一統論」以對照「興亞政策」，兼亦有未雨綢繆之意。

所謂「宇內一統論」，其思想源於日本的國學，強烈主張日本國家傳統之優秀與國民精神之純美，是具有積極復古思想的國粹主義。此種復古思想的根據，是本於憧憬古代與否定中世的歷史意識。然而，古代盛世與清淨精神的理想生活，因儒、佛等外來思想的影響而墮落式微，故必須排除外來思想之污染始能重返「古道」。日本國學家認為古道的起源，因日本乃神生之國而推始於「神代」，因而對國家成立之神話產生宗教性信仰。此種神國觀的神道思想，一方面確認日本的優越性而逐漸變成國粹主義，另方面則與尊王思想結合，認為天皇居世界中心之地位，承萬世一系之光榮（註四四）。

在「宇內一統論」中，荒尾首先歌頌日本「國體」的神聖不朽，冠絕萬國（註四五），略謂：

統一六合，奄有四海之宏猷遠謨，實爲皇祖天神創世建國所宣揚的大叡旨，發而顯揚於列聖天皇之懿德不續，傳而載記於不朽之皇典圖書，赫然光耀於吾人之耳目，如三光之麗於九天。爾來歷時數千載，皇德日新，大道愈顯，寶祚之興隆天壤無窮，是豈非我國體冠絕萬國之真相？仁義忠孝出自天賦，君臣大義、父子大倫則源自皇澤，沛然而爲忠勇尚武之氣，發而爲盡忠報國之情，自數千載之前以迄數千年後，無論智、愚、長、少，皆不知其所以然者，此豈非我民風冠絕萬國之特質？（註四六）

荒尾進而強調日本「冠絕萬國」的國體，是以統一四海六合、弔民伐罪、興廢繼絕爲天職，意在藉此將其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主義，賦予「皇國天職」的神聖意義。荒尾說：

我國皇國也，爲天成自然之國也；我國統一四海六合乃尊承天命，亦是皇祖、祖宗之宏猷大謨，我國未來之最大目標也。惟皇道之不行於天下者久矣！海外各國概以狼吞虎嚥爲唯一計策，以射利貪慾爲最大目標，其競奔爭奪之狀恰如群犬之爭腐肉。當此之時，上奉天授神聖之眞君，下率忠勇尚武之良民，弔民伐罪、繼絕世、舉廢國，以天成自然之皇道，攘除狼吞虎嚥之蠻風；以仁義忠孝之倫理，端正射利貪慾之邪念，使天日照臨之寸土一民皆得沐浴皇恩，此豈非我皇國之天職？豈非我君我民對祖宗列聖之本務？（註四七）

分析荒尾對日本「國體」的歌頌，以及所謂弔民伐罪、興廢繼絕的「皇國天職」，可以知道荒尾以樂善堂爲中心所推動的中國改造計畫，只是其皇國天職的一部分。換言之，荒尾的「興亞策」是以「宇內一統論」爲依歸的；而所謂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主義思想與行動，也以「統一六合，奄有四海，實現皇祖祖宗之宏猷大謨」爲終極目標。如此的思想與行動，不僅上承幕末經世家的皇道主義宇宙哲學，以及以「日本獨尊，守內混同」爲基本觀念的皇國史觀（註四八），而且下啓國粹主義者以日本爲中心，並以家父長制及「華夷秩序」類推的亞細亞主義。此種亞細亞主義，實與內田良平、頭山滿等玄洋社及黑龍會系統所代表的侵略性「大亞細亞主義」相去不遠；而且也與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的「大東亞共榮國」一脈相承，其共同的特徵都是以皇國思想發展東亞經綸，並為其侵略主義披上神聖的外衣。

綜合上述，可知荒尾的「興亞策」，是以樂善堂為中心對中國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造」計畫。此種改造計畫雖然是源於日本對東亞的危機感與使命感，也就是本於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主義；不過，由於唯恐中國富強之後反噬，荒尾乃強調「興亞策」為皇國天職，其終極目標亦以「字內一統」為依歸，企圖將中國納入其皇國史觀的「國體論」中。然而，此種以皇國思想發展的「東亞經綸」，已失去了單純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之理想，反而突顯出日本為追求東洋盟主地位而不擇手段的現實作風。

三、荒尾精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

荒尾精以漢口樂善堂作為「改造中國、拯救東亞」的根據地前後三年餘，其所屬浪人的調查活動確實提供了不少中國內地的情報資料以及改造中國的計畫（註四九）。惟因樂善堂經營所得有限，支應浪人活動所需資金已感難以為繼，如欲進行更大的活動，勢須另籌經費來源，於是荒尾決心另覓出路。

一八八八年，俄國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日本的危機感遽然升高，誠如稍後山縣有朋所說：「西伯利亞鐵路業已進展至中西細亞，不出數年即將竣工，由俄都出發十數日即可飲馬黑龍江，吾人不可輕忘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之日，即朝鮮多事之時；亦不可忘記朝鮮多事之時，即東洋發生變動之機」（註五〇）。因此，日本在深感唇亡齒寒之餘，大陸派人士多主張積極謀求因應，國粹主義者更大聲疾呼「必須在十年內斷然改造中國，以抗拒俄國南侵之勢」（註五一）。此時荒尾亦頗以東洋情勢之險惡為憂，因而於一八九九年四月返回日本，旋即於五月十日向參謀本部提出「復命書」報告。其資料均取自樂善堂外員的調查記錄，內容共分六章，大體上是有關中國國情的調查評述以及日本的因應之道，首先是分析清朝的國勢演變；其次是評述中國洋務運動的致命傷在於缺乏人才，除李鴻章之外，餘皆不足論；而內政、軍事均腐敗不堪；西學但知模仿而已，其結果必不能超越西洋。故西力東侵，中國勢

不能支，以致邊疆藩屬、海關、礦山、港埠等先後淪喪；最後強調日本「必須振興東洋以制歐洲，捨此無以擴展鴻圖」。（註五二）

至於如何振興東洋以制歐洲，荒尾在華主持樂善堂期間，已深刻體認到「商權」在近代歐洲霸權主義擴張上的意義，歐美列強之侵略中國也與爭奪商權有關，蓋商權之所在，即權力之所在。「貿易乃國家經濟之根本，生民富饒之樞紐……處於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競爭富源之今日，富源之所在，即邦國安泰、萬民鼓腹之所繫」（註五三）。因此，荒尾深信商權的掌握是振興東亞的先決條件，認為「要在滔滔不絕的西力東漸之中屹立不搖以振興東亞，首需取得東亞之商權，商權之所歸，即國際間一切權力威勢之所歸」（註五四），顯然已有重商主義的傾向。

不過，基於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荒尾認為日本欲振興東亞，必須本身先能富強並以貿易方式改造中國；換言之，中日兩國必須相互提攜以謀求彼此之富強，所以荒尾指出：

日本不富強，則將無力挽救東亞之衰運；日支不提攜合作，則無力遏阻西力之東漸；欲謀日支之提攜富強，首需振興兩國之貿易（註五五）。

事實上，近似荒尾的重商主義以及主張對外以經濟提攜謀求富強的觀念，早在幕末時期即已萌芽；當時的洋學者本多利明（一七四四—一八二一）即為典型的代表。本多經世思想中的海外發展論，強調唯有效去西洋殖民帝國從事海外貿易與殖民事業，才能獲致國家的富強與抗拒西洋列強的實力。他指出：「伊察巴尼亞（西班牙）、拂良察（法國）、波爾吐瓦爾（葡萄牙）、諸尼利亞（英國）、和蘭陀（荷蘭）諸國通船舶，資送器材、物種或布帛、鳥畜之類以補其人力不足，並取盈交易，運送他國，以所得大利，撫育土人，遂漸啓文明而成繁榮大國」（註五六）。因此，本多力倡殖產興業與海外貿易，並且認為這是「國君天職」所在；至於實施的方法，則提出所謂富國四大急務（註五七），其中「船舶」一項，主張利用官船從事官營貿易，尤能反映當時日本經世學者的重商思想以及抗禦西力東漸的積極態度。而荒尾深信掌握商權是振興東亞的先決條件，其思想可說是與本多異曲同工，一脈相承。

荒尾除了主張中日提攜合作以振興貿易、抗拒西洋列強的構想外，也提出一些較為具體的實施方案。譬如他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的演講詞中，特別強調商權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因此中日兩國必須提攜以謀求彼此的富強，並以培養對抗西歐各國的實力為急務，而為達成此目的，必須培養從事中日貿易的專門人才，所以計畫在上海成立「日清貿易研究所」（註五八）。荒尾甚至表示，為期實現中日的提攜合作，他願意卸下戎裝加入工商業行列（註五九），此外，荒尾也主張由日本浪人扮成商賈，在中國各地設立「日清貿易協會」，其總部則設於上海，其目的是：（一）可藉商會為掩護進行調查；（二）可藉此吸引投資者；（三）可藉以擴張日本在中國之商權（註六〇）。

荒尾的中日提攜構想與實施方案，經多方的奔走遊說之後，逐漸為朝野人士所接受。首先是獲得當時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大藏大臣松方正義、農商務大臣岩村通俊的讚許，應允補助設立研究所。其後荒尾在歷時一年的全國性巡迴演講中，更獲得各界人士的共鳴支持，不少青年響應號召，志願追隨前往中國。經體格檢查與學科甄試結果，荒尾自五百餘名志願就學者中選出一百五十名，做為「日清研究所」的第一屆學生。

不過，就在荒尾準備率領學生航渡上海之際，原先應允給予經費補助的松方藏相與岩村農相，由於無法立即給付現金，僅能將當時北海道時價十萬圓的山林地交給荒尾拍賣，所得資金即做為研究所開辦的經費。不意岩村農相生病辭職，由陸奧宗光繼任，山林局長以該研究所與商務無關，拒絕撥地拍賣；頓使荒尾進退兩難，陷於絕境，一度想自殺以示負責。後經當時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斡旋，熱心遊說總理大臣山縣有朋與松方財相，內閣終於應允撥款四萬圓補助金，荒尾一行始得順利成行。

一八九〇年九月三日，荒尾帶領研究所學生、教職員、日清貿易協會人員共計二百餘人，由橫濱搭乘橫濱丸前往上海，九日抵達，隨即進住位於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畔的日清貿易研究所校舍及宿舍。並於同月二十日舉行開學儀式。研究所由荒尾任所長，根津一、西村忠一、小山秋作、宗方小太郎等四人為幹事；原長崎商業學校校長豬飼麻二郎任教務主任；教師方面有御幡雅文、草場謹次郎、小濱為五郎、片山敏彥、井深彥三郎、木下賢良；中國人沈文藻、桂林，以及英人阿斯頓等（註六一）。至於學生的成份，則因入學的動機不一而顯得複雜。其中固不乏深受荒尾感召而志在發展中日貿易者，但亦有渴望組成類似「東印度公司」的逐利之徒；甚至有逃避兵役的投機分子。因為流品不一，所以當日本議會於同年十二月決議大量削減研究所的補助經費時，面對一籌莫展的前途，約有

三十名的學生即因情緒失控，不服管教而退學（註六二）。不過，經此波折之後，留下來的學生均能安心在學，並如期畢業。

在課程安排方面，每一學年分爲前後二季；每季又分爲前後二期；每週上課時數從四十至四十八小時不等。課程內容方面，中文會話課每期每週均爲十二小時，占全部上課時數約四分之一以上，比例最高；其次是英文，每期每週均爲六小時，合計中、英文的課程佔全部時數的三七·五%至四一·八六%，這當然是基於振興東亞貿易並抗拒西洋勢力的考慮，故特別加重中英文訓練。與英文課時數相同的是柔術體操，可見體能訓練也受到相當重視。再次是商業地理、中國商業史，各爲三小時，均屬於貿易專業的課程。以下即是該研究所第一年的課程安排情形（註六三）：

課程	前 半 季		後 半 季	
	前 期	後 期	前 期	後 期
中 文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英 文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商業地理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中國商業史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簿記學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中日文學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作文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商業數學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經濟學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法律學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習字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商務實習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臨時課程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柔術體操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合計	四〇六一	四〇六一	四〇六一	四〇六一
會話	會話、讀本、會話	會話、讀本、會話	會話、讀本、會話	會話、讀本、會話
拼字、讀本、會話	拼字、讀本、會話	拼字、讀本、會話	拼字、讀本、會話	拼字、讀本、會話
亞洲部份	亞洲部份	亞洲部份	亞洲部份	亞洲部份
上中古部份	上中古部份	上中古部份	上中古部份	上中古部份
單式	單式	單式	單式	單式
讀書論講	讀書論講	讀書論講	讀書論講	讀書論講
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文記事文
「和算」	「和算」	「和算」	「和算」	「和算」
楷書	楷書	楷書	楷書	楷書
貿易上的心得	貿易上的心得	貿易上的心得	貿易上的心得	貿易上的心得
古式、兵式	古式、兵式	古式、兵式	古式、兵式	古式、兵式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日清兩國度量衡使用法	日清兩國度量衡使用法	日清兩國度量衡使用法	日清兩國度量衡使用法	日清兩國度量衡使用法
（日清貿易研究所）	（日清貿易研究所）	（日清貿易研究所）	（日清貿易研究所）	（日清貿易研究所）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日清貿易品研究、	日清貿易品研究、	日清貿易品研究、	日清貿易品研究、	日清貿易品研究、
日清各類商業組織	日清各類商業組織	日清各類商業組織	日清各類商業組織	日清各類商業組織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報告契約文	報告契約文	報告契約文	報告契約文	報告契約文
「洋算」	「洋算」	「洋算」	「洋算」	「洋算」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中國部份	中國部份	中國部份	中國部份	中國部份
中世部份	中世部份	中世部份	中世部份	中世部份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複式	複式	複式	複式	複式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會話、習字、聽寫	會話、習字、聽寫	會話、習字、聽寫	會話、習字、聽寫	會話、習字、聽寫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經濟原論貿易論	經濟原論貿易論	經濟原論貿易論	經濟原論貿易論	經濟原論貿易論
法律原理日本商法	法律原理日本商法	法律原理日本商法	法律原理日本商法	法律原理日本商法
行書	行書	行書	行書	行書
研究所商務之實踐	研究所商務之實踐	研究所商務之實踐	研究所商務之實踐	研究所商務之實踐
、商會之實習	、商會之實習	、商會之實習	、商會之實習	、商會之實習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在生活教育方面，雖然該研究所在性質上屬商業學校，學生的思想難免深受營利觀念所支配，但荒尾本人及其行政幹部均以高潔的武士精神自律，期能感化學生氣質；並以忍辱負重精神訓諭，以激勵學生恢宏的志業，荒尾曾經勉勵學生說：

凡人欲爲非常之事業，需有非常之決心。譬如（日清貿易）商會亦古今未有之一大事業也，豈能保證前途不致有難？惟余不論遭逢何種困難，亦絕不動搖志而爲私利賤行。嗚呼諸君，能使商會前途不生困難，並早日獲得幸福者，全賴諸君體格健全、氣宇壯闊、品行端正、學術精進，諸君勉乎哉！（註六四）

對於當時會社（公司）、洋行的尙利風氣，以及那些對該研究所未來畢業生將投入振興中日貿易一事抱持懷疑態度的凡夫俗子，荒尾均告誡學生應有堅定不移的意志，他說：

嗚呼！燕雀安知諸君鴻鵠之志？諸君實力乃今日實業界之模範也，一掃積弊之創業家也，復興亞細亞之委員也，我國富強之創造者也，豈可與區區燕雀爲伍邪，嗚呼！諸君切記。（註六五）

因此，其後甲午戰爭爆發時，該所畢業生一百二十名中，即有七十二名經荒尾推薦從軍任翻譯官；戰爭結束後，仍繼續在中國各地日本機關任職者，仍有二十七人（註六六），顯然是與荒尾的生活教育有相當關係。

一八九二年，日清貿易研究所發行《清國商業總覽》一書，厚達二千餘頁。其內容詳述中國經濟事情及其他重要事項，是由荒尾士官學校及任職參謀本部時代的知交根津一，根據漢口樂善堂外員多年蒐集的珍貴資料纂輯而成。全書共分二編，第一編又分爲天、地兩部，天部內含商業、地理、庶制、運輸、金融、交通、產業等部門；地部係敘述中國自古以來的工商及農事變遷情形。第二編分爲工藝品、陸產品、海產物等部，對各類商品之敘述甚爲詳細。此書的發行，確能代表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學術成就，故頗受各方肯定讚賞，《東亞先覺志士記傳》記載其事云：

自前年清國商業總覽發行後，世間始知中國實情，識者得見此書亦頗爲感奮，研究所之價值遂爲世所公認。

大阪豪商岡崎某等亦因而允諾出資，按先前計畫在上海設立日清商品陳列所。（註六七）

所謂「日清商品陳列所」亦即「瀛華廣懋館」，原係供研究所學生商務實習之用，自是改為商品陳列所，並由一八九三年第一屆畢業學生每日十五至二十人輪流值班。當時陳列販售的商品主要有四類：（一）日本精製品，（二）日本加工品，（三）日本藝術品，（四）中國及其他國家產品（註六八）。雖然名為「日清」商品陳列所，但主要仍是以陳列日本產品為大宗。研究所創設宗旨，本在培養貿易專才以振興中日兩國經濟實力，但從陳列販售的商品種類來看，明顯是側重日本產品的銷售與介紹。由此可知，所謂中日提攜合作者，事實上只是以日本為主而中國為輔；甚至是藉提攜合作之名行擴張獨占之實。觀其後日本在華所實施的一連串提攜合作政策，無一不是名實相違、欺世盜名的醜劇，可知日本亞細亞主義的虛偽邪惡本質了。

由於「日清商品陳列所」的銷售情況良好，每日的營業額高達一千五、六百圓，益增荒尾對本身向所堅持的中日提攜合作構想之信心，乃有進一步擬將「陳列所」與「研究所」合併，組成「東方通商協會」的計畫。荒尾所擬定的「協會」宗旨是：

（1）振興日清貿易，收回東亞商權。

（2）協調兩國私交，避免中外衝突，一旦有事則居間調解，以減少國際爭端。（註六九）

顯然，對荒尾而言，「研究所」與「陳列所」都只是手段運用而已，其最終目的仍是在「振興日清貿易，收回東亞商權」；同時，為能達成抗拒西洋列強的勢力，對中國仍須進一步加工改造，以便日本可以完全操縱控制。因此，所謂「協調兩國私交」、「有事則居間調解」，事實上都是假中日提攜合作之名，以遂其逐步操控中國之實。雖然「研究所」與「陳列所」均因甲午戰爭爆發而關閉，「東方通商協會」亦因而胎死腹中，但是荒尾以中日提攜合作為名對中國所進行的加工改造計畫，此後卻逐漸成為日本亞細亞主義或大陸侵略政策的一個典型。誠如一九一八年「中日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外務省所招認的，協同、協調或同盟的意義是在：

軍事上藉協同作戰之名，可使帝國軍隊在中國境內自由行動，且可藉此以掌握中國軍隊之編練、武器之製

造；政治上則可以「同盟」為基礎，積極干預其內政，以扶植帝國之政治勢力；經濟上則在利用提攜合作之名，從事資源的開發、市場的開拓，以促進帝國經濟之發展（註七〇）。

證諸其後中日關係史的演變，荒尾的「提攜合作」模式確有其特殊意義。譬如一次大戰後積極推動滿蒙分離運動的森恪，在其「日支經濟提攜論」一文中，即明確表示中日經濟提攜合作的真正意圖，文中露骨的指出：

當今世界大勢，不容小國弱國存在。國雖大而弱，不能獨立；國雖強而小，亦不能持續其強。故此次大戰顯示，不能充分自給自足之國家，今後在世界上無獨立之資格。故利害相同者相輔相成，國與國構成強大乃當今世界趨勢。……以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其不足者必須求之於中國。離開中國大陸，則日本不能保有自給自足的獨立狀態，亦即經濟上無從自立；而中國離開日本，在政治上亦不能自立行事，二者乃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運。……日本若能善用中國大陸及其民族，則可以達成本身成為強國大國；利用大陸生產能力可滿足我衣食及各種工業原料，而利用其消費能力以促銷工業製品，則可確保平時乃至有事時之自給自足（註七一）。

其後類似的提攜合作的政策主張極多，無論是其軍方為備戰需要而堅持的「中國必須成為日本帝國生存上的倉庫，國防上的屏障」（註七二）；或是其外務省為打開「黃種人對白種人關係的新局面」，因而積極推動以日本為主導的「東亞經濟同盟」（註七三）；抑或是其財界所引喻的「菊花的分根」（註七四），亦即以貸款投資比喻菊花的分根，便於日本經濟勢力向中國大陸擴張；乃至許多學者所主張的理論，如宮崎正義的「東亞聯盟論」、尾崎彌久的「東亞共同體」、神川彥松的「日本的門羅主義」等，都是從日本至上主義的觀點著眼，完全無視於中國為主權國家的地位，其霸權主義的心態始終一貫。因此，自荒尾以下的各種提攜合作主張，事實上也提供了其後日本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的藍圖，明顯反映出日本謀求建設「大地域經濟主義」的企圖（註七五），以及掌握亞泰基（autarchy）經濟圈與生存空間的野心（註七六）。

如上所述，荒尾在一八八〇年代後期，由於俄國開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所激起的新危機時代中，以其在華主持

樂善堂調查工作的經驗，提出中日提攜合作，以振興兩國貿易實力做爲對抗歐洲列強的手段。荒尾並且辭去軍職，以浪人的身分在上海成立日清貿易研究所，做爲培養貿易專才之用。此種植根於亞洲共同體的提攜合作，正如其後「東亞同文會」首任會長近衛篤磨與康有爲的對話所云：

東洋的時事日益迫切，今日的東洋問題並非只是東洋的問題，而是世界的問題。歐洲列強皆爲了本身利害而互爭東洋問題，然而，東洋乃東洋之東洋，只有東洋才有決定東洋問題的權利，美國的「門羅主義」正是此意。在東洋有義務實行亞細亞的門羅主義者，事實上是在責我兩國的肩膊上。（註七七）

因此，荒尾主張的中日提攜合作模式，似寓有所謂的「亞細亞門羅主義」之精神，故有學者甚至認爲是「日清同盟論」的先驅（註七八）。然而，荒尾所成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畢竟只是改造中國的一種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仍是在掌握東亞商權以對抗西洋勢力，此由荒尾擬將「研究所」與「陳列所」合併成「東方通商協會」一事，可知其行事之作風與意圖，根本是無視於中國的主權地位而蓄意予以加工改造。證諸其後日本大陸政策之發展，所謂中日提攜合作，事實上只是以日本爲主中國爲輔，甚至是藉提攜合作之名行擴張獨占之實，成爲其霸權擴張的障眼法而已。因此，若說荒尾是「日清同盟論」的先驅，則此「同盟」必非平等互專關係，毋寧是較近似一八八〇年代初期福澤諭吉的「東洋盟主論」（註七九）；亦即主張由日本以「首魁盟主」身分，「以武力保護之，以文明誘導之，使之儘速仿效我國以進入現代文明」（註八〇）的東洋盟主論。

五、荒尾精與甲午戰爭

近代日本學者討論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時，不少是從當時日本朝野有關亞細亞主義觀點的轉變立論著述；其中具有亞細亞連帶主義傾向的「東洋盟主論」，其逐漸轉向「脫亞入歐論」的過程尤爲學者所重視，認爲是戰爭爆發的關鍵所在（註八一）。

如前所述，東洋盟主論是主張以日本爲盟主而對中、韓進行改造的思想與行動。其理論的根據是基於東亞共同體的體認，誠如福澤諭吉所比喻的：「縱令我一家是石造房屋，而隔壁鄰舍盡是粗陋的木造板屋時，也絕對無法安心……因此，如欲確保防火消災，必須在我家及近鄰均予設防，萬一有事時當然加以援助，無事時勸請其主人建造類似我家之石屋亦極重要」（註八二）。然而，由於朝鮮先後發生壬午、甲申事變，激起日本朝野國權主義的昂揚，進而積極進行擴充軍備計畫（註八三）；又鑑於中法戰爭結束，深恐日本淪爲安南第二或中國第二，故福澤逐漸否認日本爲東洋盟主之說，進而急欲擺脫亞洲的牽絆而與歐美列強爲伍，曾說「世界各國之相對時，其勢如禽獸之相食；若食者爲文明國之人，被食者爲不文明之國，則我日本將加入食者之列而與文明國共求良餌歟？」抑或「與數千年來始於不振之亞洲古國爲伍，共守古風而爲文明國之人所食？」結果福澤選擇了脫亞入歐，再與歐美文明國家共狩同食亞洲的野蠻國家，並且認爲亞洲最宜獵食的野蠻國家即中國（註八四）。其他如主張「中國與朝鮮皆萬國公法化外之國」的尾崎行雄，不僅認爲應使亞洲成爲日本的殖民地（註八五），而且堅持「脫亞入歐型的國際政治論」（註八六）；又如國家主義團體玄洋社，亦極力主張對華開戰（註八七），上述的個人與團體都是具有侵略色彩的脫亞入歐論者，也是點燃甲午戰火的禍首。

就荒尾精而言，雖然早年即已懷抱「興亞」之志，但自一八八六年以迄一八九四年甲午戰前爲止，先後在華主持漢口樂善堂及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大體上都是基於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而進行活動，尤其是主持日清貿易研究所時，力倡振興中日兩國貿易以對抗歐洲勢力，其思想明顯具有以東洋對抗西洋，或是以東洋門羅主義自居的特徵，換言之，頗能顯現東洋盟主論的色彩。荒尾此種東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既使在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朝野全力推動擴充軍備並高喊對華開戰之際，亦未有重大改變。譬如荒尾在一八九三年秋季所撰寫的「對清貿易擴張意見」中，仍明顯表現其一貫的連帶意識，略謂：

夫我之於清國，較諸歐美之於清國，不僅距離甚近，而且在人種、宗教、制度、文物、人情、風俗、嗜好、生活等方面，彼有霄壤之別，而我則頗相伯仲；然而彼我之於清國，得失情況卻有不同風貌者何故？蓋彼盡

人事之經營以補自然；而我人事自然均付之等閒故也！」（註八八）

根據荒尾的意見書內容，可知其心目中有關中日的制度文物、人情風俗等均在伯仲之間，並無文明與野蠻的對峙關係，其所關心在意的的是歐美列強在華的經營情形與日本貿易擴張的得失；此種貿易擴張論，仍然著眼於東洋與西洋的商權競爭，可說是維持其一貫的亞細亞連帶主義立場。反之，脫亞入歐論者強調中日關係乃野蠻與文明的對峙，因而不斷藉朝鮮問題呼籲日本應對華進行「文（明）野（蠻）之戰」。因此，脫亞論幾已成爲福澤、尾崎，以及玄洋社、黑龍會等系統所代表的激進國家主義或大亞細亞主義者的重要特徵之一，他們所堅持的「中日決戰論」遂與荒尾的貿易擴張論形成明顯的對比。

一八九四年五月，朝鮮發生東學黨農民戰爭，代表日本激進國家主義團體的玄洋社，立即於六月中募集武裝浪人進行所謂的「天佑俠計畫」，因而點燃了甲午戰爭的戰火（註八九）。當東學黨亂起之際，福澤譏諷朝鮮民族「上流是腐儒的巢窟，下流是奴隸的群集，暗無天日，不知公私百年之利害，唯知軍艦砲銃之可怖」，因而力主武力征韓（註九〇）；對於中日戰爭，則認爲是「一種促進世界文明進步的宗教戰爭」，既使犧牲無辜的清軍亦不足惜，因爲「爲期世界文明之進步而排除其障礙物，雖然難免會有殺風景之舉，然而彼等不幸而生於清國如此腐敗的政府之下，唯有自認命運不佳」（註九一）。如此狂妄露骨的侵略思想，確與荒尾向所堅持的亞細亞連帶主義有所不同，荒尾在一八九四年戰爭初起時所撰（對支意見）書中，評述甲午戰爭的意義是：

此次我國宣戰之大旨在於確保朝鮮將來之獨立，以維持東亞永久之和平，此爲興亞之第一步。此次戰爭，近爲朝鮮、清國，遠爲印度、暹羅，實爲東亞史上之一大義戰，明乎此，則此戰之勝負，實乃決定東洋之興廢並左右歐亞大勢之關鍵（註九二）。

由此可知，荒尾在戰爭爆發後，雖也肯定甲午之戰的必要，甚至認爲是東亞史上的一大義戰；然而，荒尾真正關切的仍然是「興亞」的問題，亦即戰爭可能對東洋興廢及歐亞大勢的影響。至於文明與野蠻之爭、領土的割讓與占有，似非其關注之焦點。因此，戰爭爆發後，荒尾立即推薦自己的知交舊識及學生從軍效命，包括樂善堂時代的

浪人與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教職員計十九人，畢業學生七十二人，大部分均擔任軍中的翻譯工作（註九三）。不過，荒尾本人則關閉日清貿易研究所並返回日本，自一八九四年秋至九六年的一年半間蟄居於京都。在此期間，荒尾雖未參與戰爭，但對戰爭仍寄予高度的關切，此由其賦詩感懷之內容可以窺知一二。

其一（一八九四年十一月）

閩國擾擾事戰爭，幾萬兵馬乘車趨；山人獨坐幽窗下，只見浮雲動太虛。
風葉半紅酒微醉，伎倆極處莫他奇；山人不望功名事，雲白山清好境涯。

其二（一八九五年二月）

尋梅曳杖驚相伴，覓友敲碁亦有鄰；公朝未報春消息，贏得山林自在身。

近年閩國入煙塵，朝野匆忙未覺新；請看東山深窟裡，清平別有一般春。（註九四）

荒尾在詩句中流露出他對「閩國擾擾事戰爭」、「近年閩國入煙塵」的關切，表面上雖自白心跡是「山人不望功名事」、「贏得山林自在身」；但是對於「公朝未報春消息」仍難掩遺憾和失望。不過，他對戰爭的結果以及國家前景則抱持極樂觀的態度，甚至信心十足的揚言「請看東山深窟裡，清平別有一般春」。因此，在戰爭後期，他即著手撰述《對清辨妄》一書，重申一貫堅持的亞細亞連帶主義。該書首先澄清中國並非野蠻之國，間接批判了脫亞論者對中國的誣蔑。略謂：

漢人建國凡五千數百年，據支那本部之地三十七萬數千方里。夫國土廣大者，其國民規模必大；建國久遠者，自然之淘汰必劇，淘汰之劇與規模之大，因緣相乘，凡百事物必生消積兩極化之結果，蓋自然之勢也。是故清國極智極愚者有之；極富極貧者有之，自美醜善惡大小以至剛柔勇怯忠奸，莫不各達於至極之兩端，此所以彼之真相實力最難速知概言也。惟其間有一普遍天賦之性情存焉，蓋其國民本剛毅之民也，堅忍不拔之民也。（註九五）

荒尾自一八八六年起浪居中國凡七、八年，主持漢口樂善堂工作期間，更常深入採訪中國民風國情，對於中國的認識與瞭解，自非尋常的官僚政客或激進的國家主義者可比。所以他深知「中國的真相實力最難速知概言」，尤其肯定中國民族性中具有剛毅、堅忍不拔的秉賦，更是當時沈迷陶醉在光榮勝利中的日本朝野人士所無法領會。因此，荒尾特別強調，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只是暫時性現象，「清國人民仍具有足以與之共謀東洋大事的性格」，略謂：

清國國民的性情稟賦大體如此，如此之人民有三億八千餘萬也，斯民若能訓養統帥得宜，則可以蹈白刃而赴水火，以至於所謂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故可以說仍具有與之共謀大事之性格。余大聲疾呼以告朝野之志士仁人，東洋之大事唯日清兩國同心戮力經營之一途而已，若喪失此一途，則茫茫大陸不歸西歐諸國宰割分食者，幾希也！（註九六）

顯然，荒尾並沒有被戰爭的勝利沖昏了理性，所以仍然堅持「東洋之大事唯日清兩國同心戮力經營之一途」，此種近乎「日清同盟論」的思想，充分顯示了荒尾向所堅持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之立場與特徵。換言之，荒尾的亞細亞連帶主義是始終一貫的，即使是肯定甲午戰爭的軍事行動，荒尾也是著眼於「興亞」的意義。因此，荒尾的亞細亞主義不僅具有前述的「東洋盟主論」精神，而且也充分顯示其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

荒尾既已洞悉甲午戰後之東洋將為歐洲列強注視之焦點，因而極力提倡中日兩國的經濟同盟。當時日本藏相松方正義力贊其議，荒尾乃於一八九六年一月赴上海瞭解戰後實情，同時伺機遊說中國朝野有力人士，慫恿兩國實業家攜手合作。同年八月，荒尾抵達台灣，試圖成立「紳商協會」以結合台灣島民與日本內地人，並計畫前往華南地區擴展經綸鴻圖，不意身染鼠疫，同年十月三十日病逝，得年三十八歲（註八七）。

如上所述，當日本朝野因朝鮮問題而極力主張對華開戰，並以脫亞入歐及國家主義思想呼應「日中決戰論」之際，荒尾仍堅持其亞細亞連帶主義的貿易擴張思想，因而與「日中決戰論」的領土擴張野心形成強烈對比。逮甲午戰爭爆發，荒尾雖然推薦其同志及學生從軍效命，但其本身只肯定戰爭的「興亞」意義，以及關心東洋的興廢與歐

亞大勢的轉變而已。就竹內好的觀點而言，凡具有「亞洲連帶（不論是否以侵略為手段）的趨向」即是亞細亞主義（註九八），則荒尾雖然肯定甲午戰爭的正面意義，應仍不失其亞細亞連帶主義的特質，此由戰爭結束後荒尾所著《對清辨妄》一書中，一再澄清中國的真相與實力，並且擬進一步推動中日的經濟提攜合作，可以充分印證荒尾的亞細亞連帶主義本質。

六、結 論

綜含上述，有關荒尾精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及其行動，可以獲得如下的數點結論：

第一，就個人的立身行事而言，荒尾出身於幕末維新初期的沒落武士階層，自一八八三年士官學校畢業之後，除在聯隊服役兩年、參謀本部任職一年外，直至一八九六年病逝台灣為止，其一生的志業所在以及活動範圍均以中國為主。一八八六年荒尾初次來華主持漢口樂善堂工作時，雖仍屬軍籍身分，但工作方針與經費籌措均自行負責，其特立獨行作風頗具特色；逮一八九〇年主持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時已完全脫離軍職，故其大陸經營的思想與行動，更能代表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

第二，就荒尾精的亞細亞主義思想與行動之發展而言，其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萌芽期：指西渡中國以前，由於在學期間深受征韓論爭與壬午事變的刺激，因而萌生「興亞」之志；甚至士官學校甫畢業，即匆匆計畫辭去軍職航渡大陸，以謀實現取中國、治中國、興東洋的壯志豪情。惟其尙無興亞的具體政策與行動綱領，但憑國家主義的狂熱衝動與唇亡齒寒的亞細亞共同體自覺而已。故此時荒尾的亞細亞主義，似屬單純而富於浪漫色彩的亞細亞連帶主義。

(二)形成期：指荒尾來華主持漢口樂善堂調查研究工作的時期。此時他利用大陸浪人對中國的大江南北，尤其是西北及西南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調查，以便為「改造」中國鋪路。此種改造計畫的「興亞策」，雖然是源於日本對東亞的危機感與使命感，也就是本於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不過，由於唯恐中國在改造富強之後對日反噬，荒尾

乃強調興亞策爲皇國天職，其終極目標也以「字內一統」爲依歸，企圖將中國納入其皇國史觀的「國體論」中。然而，所謂「東亞經綸」既已沾染日本的皇國思想，則原本單純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之理想必因之褪色，反而突顯出日本爲追求東洋盟主的地位而不擇手段的現實作風。

(三)發展期：指荒尾主持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以後直至病逝爲止的時期。此時荒尾以在華多年調查研究的經驗，提出中日提攜合作以振興兩國貿易實力並對抗歐洲的構想；進而辭退軍職，全力在上海辦理研究所以培植貿易專才，並爲掌握東亞之商權奠基。此種植根於亞細亞共同體的提攜合作模式，雖寓有「東亞門羅主義」或「日清同盟論」的精神，惟此提攜合作模式係建立在日本爲「首魁盟主」的基礎上，所以使荒尾的亞細亞連帶主義具有「東洋盟主論」的色彩。此後歷經甲午戰爭直至病逝爲止，此種性質的亞細亞連帶主義始終爲荒尾所堅持。

第三，就荒尾精的亞細亞主義思想與行動之表現而言，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意識以及由此衍生的興亞政策。雖然，從萌芽期中近似單純而富於浪漫色彩的連帶主義，漸變到形成期中爲改造中國而研擬的興亞策，乃至發展期中強調具體務實的中日經濟提攜合作計畫，可以發現荒尾由浪漫色彩濃厚的大陸雄飛論，逐漸演變成較爲務實而具體的「改造計畫」，但是荒尾一以貫之未曾稍變的是亞細亞共同的連帶意識。尤其是甲午戰前日本朝野競相高唱國家主義與脫亞入歐論之際，荒尾仍堅持其中日經濟提攜合作以振興東洋的主張，更顯示「脫亞」與「興亞」、貿易擴張與領土占領，乃至亞細亞共同體的連帶主義與脫亞入歐的大亞細亞主義的對立立場與特徵。

第四，就近代以來日本大陸政策所受的影響而言，荒尾雖是一介大陸浪人，但其成就與影響絕不只是完成一般性的調查工作而已；其有關改造中國的根本方針、主張中日經濟提攜合作以抗拒歐洲勢力的興亞政策，對於此後日本的大陸經營均具有相當的啓示與引導作用。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即認爲征韓論、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乃日本一脈相承的宿命（註九九）。因此，近代以來日本大陸政策所推動的「日支經濟提攜論」、「大地域經濟主義」、「亞洲的門羅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所謂提攜合作的計畫方案，似均與荒尾的亞細亞連帶主義一脈相承，無怪乎有學者稱荒尾爲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指導者之一（註一〇〇）。

總結而言，大陸浪人荒尾精的亞細亞連帶主義思想與行動，不僅代表日本對西力東漸的積極回應，同時也是日

本推展大陸政策的先驅人物；尤其是荒尾始終堅持以東洋對抗西洋的經綸志業，在明治中期主張脫亞入歐的大亞細亞主義甚囂塵上之際，確實是獨樹一幟，故頭山滿譽之為「五百年一見的天縱英傑」（註一〇一），堪稱為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

註釋

註一：所謂浪人，據東京創元社《日本史辭典》的解釋，是指失去封祿並離開主家的武士，又稱牢人、浪士。浪人與牢人的用法原本不同，前者指奈良平安時代至鎌倉時代離開本籍漂泊他鄉的百姓，亦即所謂的浮浪人；後者乃特指失去封祿並離開主家的武士而言，自室町時代以迄江戶時期均沿用之。惟自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兩者意義漸至混用，並且成為失去封祿離開主家的軍人、官吏之總稱。本文所使用的「大陸浪人」一詞，乃指不具官方身分，與政府機關亦無直接隸屬關係，僅以個人身分在亞洲大陸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等特殊活動的日本人而言，其意義與日本國家主義者所謂的「東亞志士」、「先覺志士」等大致相同。

註二：參閱葦津珍彥《明治維新と東洋の解放》新勢力社，昭和三九年。又，河源宏，《日本近代とアジア觀の構造》，見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一一卷三號。

註三：參閱黑龍會俱樂部編《國士內田良平傳》，原書房，一九六七年。瀧澤誠《評傳內田良平》，大和書房，一九七六年。Sang Il Han, Uchida Ryohei and Japanese Continental Expansionism, 1874-1916, Ph.D. Dissertation,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Calif., 1974.

註四：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序，頁一一二，黑龍會出版部，昭和八年十二月。

註五：如安岡召男《日清戰爭前的大陸政策》（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大畑篤四郎《大陸政策論的史的考察》（《國際法外交雜誌》，第六八卷五、六號）、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八年）、鹿島守之助《我が大陸政策の史的考察（一）（二）（三）（四）》（《國際法外交雜誌》三十六卷，第四、五、六、九

期)、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金禾山版社,民國八十一年)等。

- 註六:譬如竹內好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松澤哲成《アジア主義とファシズム》,れんが書房新社,一九七九年。葦津珍彦《大アジア主義と頭山滿》,改訂版,日本敎文社,一九七二年。原田勝正《アジア連帶主義についての研究ノート——日清戰爭にいたる段階における——》(《歴史評論》,一〇二號)。初瀬龍平《アジア主義・アジア觀ノート》(《北九州大學法政論集》,五卷一號)。

- 註七: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解説)》,收於竹內好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アジア主義》,前引書,頁一二。

- 註八:同上書,頁一三。

- 註九:同上書,頁一四。

- 註一〇:初瀬龍平《傳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九州大學出版會,一九八〇年,頁二二—二三。

- 註一一:參閱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黑龍會出版部,昭和八年十二月,頁七〇;小山一郎《東亞先覺荒尾精》,頁七〇。

- 註一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四七。遠山茂樹《征韓論、自由民權論、封建論》,見《歷史學研究》,第一四三、一四五號。

- 註一三:的野半介《江藤南白》,下卷,序文。

- 註一四:黑龍會編《西南記傳》,下卷之一,頁六—七。

- 註一五: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番町書房,頁一三五—一三六。

- 註一六:井上稚二《巨人荒尾精》,左久良書房,明治四三年,頁七〇。

- 註一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〇九。

- 註一八:玄洋社社史編纂會《玄洋社社史》,玄洋社社史編纂會出版,大正六年,頁二三九。

- 註一九:壬午事變後,日本明治政府決定了大規模擴軍方針,並自一八八三年度實施;此項擴軍政策,使日本軍力正式轉換成外征的攻勢武力,形成甲午戰爭時日本軍力的基本架構。參閱高橋秀直《形成期明治國家の軍備擴張政策——壬午事變後の軍

擴大決定をめぐって——，見東京大學史學會《史學雜誌》，第九九編第八號。

註二〇：《玄洋社社史》，前引書，頁二三九—二四〇；《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一〇。

註二一：《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二五—三二六；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二。

註二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二六—三二七。

註二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一—三二七。

註二四：同上書，頁三一七—三一八，《玄洋社社史》，前引書，頁六一七。

註二五：《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一七—三一九；《玄洋社社史》，頁六一八。

註二六：《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三〇—三三一。

註二七：同上書，頁三三一—三三五。

註二八：有關日本幕末的經世思想與海外雄飛論，可參閱拙著《甲午戰前的日本大陸政策》，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三期，民國七十四年。

註二九：參閱原田勝巳《大アジア主義思想形成への展望》，見《歷史學研究》，第二二九號。

註三〇：黑龍會《西南記傳》，上卷之一，附錄，頁六四。

註三一：參閱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昭和五九年，頁一三七—一四三。

註三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三六—三四二。

註三三：同上書，頁三四七—三四九。

註三四：同上書，頁三七〇—三九五。

註三五：同上書，頁三四九—三五三。

註三六：參閱篠原一、三谷太郎編《近代日本の政治指導》，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〇年，頁二五四—二五六。

註三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四六。

註三八：同上書，頁三二六。

註 三九：參閱李永熾〈明治初期日人荒尾精的思想及其在華活動〉，見《大陸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三期，頁九七—九八。

註 四〇：《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六一—三六二。

註 四一：同上書，頁三六二。

註 四二：同上書，頁三六二—三六三。

註 四三：同上書，頁三六三—三六四。

註 四四：參閱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昭和五七年，頁二二三—二二九。

註 四五：日本的「國體」，是指日本特有的國家形象（即「國風」）或性格（即「國柄」），含有倫理、價值觀、風俗習慣等之意義。參閱《現代史資料・國家主義運動》，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九年，頁三一六。Nobuya Bamba, *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 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 1924-1929, Kyoto: Minerva Press, 1980, p.8.

註 四六：《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六四—三六五，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五二—一五九。

註 四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六八—三六九。

註 四八：松本三之介《幕末國學の思想史的意義》，見《日本思想大系51國學運動の思想》，岩波書店，一九八二年，頁六五三—六五五。

註 四九：《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九六；小山一郎《東亞先覺荒尾精》，頁四三—四四。

註 五〇：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一九六六年，頁一九六。

註 五一：小山一郎《東亞先覺荒尾精》，頁四〇。

註 五二：同上書，頁四七—七九。

註 五三：荒尾精《對清貿易擴張意見》，見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八〇。

註 五四：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七六。

註 五五：同上書，頁三六。

註 五六：本多利明《西域物語》，上，見《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書店，一九八二年，頁二二—一二二。

註 五七：所謂四大急務即：（一）焰硝，指不涉及戰爭用途的火藥，藉以爆破岩石，開通河道之用。（二）諸金，指開發各種礦

產。（三）船舶，主張以官船從事官營貿易。（四）屬島，指開發各島嶼。

註 五八：荒尾精的博多演講詞，見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三八—四五。

註 五九：同上註。

註 六〇：井上雅二，前引書，頁八〇；《東亞先覺志士記傳》，頁三九八。小山一郎，前引書，頁四四。

註 六一：《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三九七—四〇三。

註 六二：松岡恭一等《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沿革史》，頁一五。

註 六三：同上書，頁四三—四四。

註 六四：荒尾致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函，見《東亞先覺志士記傳》，頁四〇七—四〇八。

註 六五：同上書，頁四〇八。

註 六六：松岡恭一等，前引書，附錄《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通訊錄》。

註 六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四二—四二二。

註 六八：松岡恭一，前引書，頁一〇三—一〇四。

註 六九：同上書，頁一四〇。

註 七〇：轉引自關寬治《現代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誕生》，福村出版，一九六六年，頁一九八。

註 七一：參閱山浦實一《森恪》，原書房，一九八二年，頁九五八—九六四。

註 七二：《宇原一成關係文書》六，轉引自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大學生版會，一九七八年，頁一九七。

註 七三：以「東亞經濟同盟」為手段，藉以實現「亞細亞主義」的觀念，為當時外相後藤新平所主張。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三卷，勁草書房，一九三八年，頁六四二—六五六。

註 七四：一九一〇年寺內正毅任職朝鮮總督時，大陸浪人西原龜三以熟悉韓事而見知於寺內，其後朝鮮銀行總裁市原盛廣病逝後，

西原特推薦長於經濟事務的勝田主計繼任之。西原與勝田均受尾崎敬義《對支放資》的影響，皆主張對華貸款投資，藉以

獲取在華利權並扶植日本勢力。此種主張亦深受寺內所激賞，故寺內組閣後（一九一六年十月），即以勝田爲藏相，西原則來華進行貸款投資事宜，勝田即比喻西原的投資政策爲「菊花的分根」。參閱山浦貫一《森恪》，前引書，頁二〇〇—二〇六；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三卷，前引書，頁八三八；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天津大公報社。民國二十一年，頁二二八—二三一。

註 七五：參閱 Joyce C. Lebra ed., *Japanese'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pp. 1-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註 七六：亞泰基是一種以本國爲中心而排除他國的經濟圈式生存空間。當時日本認爲大英帝國、泛美門羅主義、歐洲聯盟、蘇俄大斯拉夫主義等，皆已相繼建立自給自足的亞泰基。日本則因天然資源不足，建立亞泰基尤爲迫切。參閱馬星野《經濟世界的新路——亞泰基》，見《申報月刊》二卷十號，頁十五—二十。

註 七七：近衛篤磨日記中的「康有爲對話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條），見霞山會編《近衛霞山公》，一九二四年，頁一四四。

註 七八：參閱篠原一、三谷太郎《近代日の政治指導》，前引書，頁二六〇。

註 七九：一八八一年九月刊行的《時事小言》中，福澤諭吉強調「當今西洋諸國文明日進，其文明進步兵備亦隨之增進；其兵備增進之同時，吞併之野心亦自然與日俱增，而逞其野心之地無疑是在亞細亞東方。……方今東洋各國之中，爲文明中心並領頭對抗西洋各國者，非日本國民誰與？故應覺悟保護亞細亞東方乃我責任也」（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五卷，頁一八六—一八七）福澤此時即強調日本是東亞細亞之盟主。

註 八〇：同上書，頁一八七。

註 八一：例如細野浩二《東洋盟主論の隘路と「脱亞論」の理路》，見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討究》，第二七卷第一號；岡義武《國民的獨立と國家理性》，見唐木順三編《世界のなかの日本》，筑摩書房，一九六一年；阪野潤治《東洋盟主論》と《脱亞入歐論》——明治中期アジア進出論の二類型——，見佐藤誠三郎、R・ディンクマン編《近代日本の對外態度》，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四年；原田勝正《アジア連帶主義についての研究ノート》日清戰爭にいたる段

階における——，見《歴史評論》一〇二號。

註 八二：福澤諭吉《時事小言》，見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五卷，頁一八五。

註 八三：參閱高橋秀直《形成期明治國家の軍備擴張政策——壬午事變後の軍擴決定をめぐる——》，見《史學雜誌》第99編第

8號；高橋秀直《形成期明治國家と朝鮮問題——甲申事變期の朝鮮政策の政治、外交史的檢討——》，見《史學雜誌》

第98編第3號。

註 八四：福澤諭吉《外交論》，見《福澤諭吉全集》第九卷，頁一九五—一九六。

註 八五：中原信雄《尾崎行雄における對外強硬論の論理》，見《日本歷史》，一五〇號，頁七四。

註 八六：參閱榮澤幸二《日本における近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思想的特質とその限界——尾崎行雄を中心として——》，見《信州

大學教養部紀要人文學科》，第十號，頁三四。

註 八七：參閱《玄洋社社史》，前引書，頁二二八—二四八；四〇七—四一一。

註 八八：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八一。

註 八九：關於玄洋社社員內田良平等組成天佑俠徒，赴韓與東學黨接觸，並進而蓄意挑戰駐韓清軍，成功的點燃甲午戰火之經過，

詳載於《玄洋社社史》，頁四二九—四六一，以及《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一七三—二九六。日本學者持肯定態度

者甚多，如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見《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初瀬龍平

《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前引書：頁四一—四二。但韓國學者姜昌一認為東學黨不可能與天佑俠提携合作，否認

天佑俠的「日清戰爭挑撥論」，見姜昌一《天佑俠と「朝鮮問題」——「朝鮮浪人」の東學農民戰爭への對應と關連して

——》，見東京大學史學會《史學雜誌》，第97編第8號。本文則從一般日本學者的觀點，將天佑俠徒視為日本帝國主義

的急先鋒，對於侵略性的大亞細亞主義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註 九〇：福澤諭吉《兵力を用ゐるの必要》，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四卷。

註 九一：福澤諭吉《日清戰爭は文野の戰爭なり》，一八九四年七月廿九日，同上書。

註 九二：荒尾精《對支意見》，頁九—十。

註 九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四二六。

註 九四：井上雅二，前引書，頁一〇五。

註 九五：荒尾精《對清辨妄》，一八九五年，頁二三—二八。

註 九六：同上書，頁二九。

註 九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六〇七—六〇八。

註 九八：同註九。

註 九九：同註十五。

註一〇〇：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荒尾精條，平凡社，一九七四年，頁九二。

註一〇一：《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前引書，頁四二三；頭山滿翁正傳編纂委員會《頭山滿翁正傳》，西尾陽太郎解說，昭和五十六年十月，頁一八二。